

【论 文】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前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¹

田 鹏²

摘要：本文分析了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认为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二是未能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推广俄语与创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这些失误加剧一些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

关键词：语言政策 民族主义 乌克兰 苏联

一、引言：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

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二是语言的交流作用。世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语言政策更多地成为民族及国家建构的手段之一。³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发端于欧洲，始于1618-1648年欧洲30年战争之后，其标志性事件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⁴ 而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之后，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使得建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追求：1816年至2000年的185年间，总共有191个新国家（包括实行新政体的国家）加入国际体系，绝大部分都声称其为国家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⁵

Philip G. Roeder 将这191个新国家的产生（或演变）方式归纳为去殖民地化、原有国家分裂（或从原来国家分离）、现有国家统一（或新国家获得承认）等三种。⁶ 无论那一种方式，民族

¹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1期，此为修订稿。

² 作者为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授。

³ 语言政策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地位规划（关于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规划（关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料库规划（关于语言本体）。语言地位规划是对各种不同语言在诸如行政管理、司法体系、公共服务、教育、传媒等方面使用的规定以及这些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语言教育规划则涉及到通用语言的推广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等；语料库规划主要指对语言书写形式、发音及语言用语等的规范化要求。例如，创立新的文字形式或改革原有文字的书写形式，或从多种书写形式中选择标准，等等。本文主要涉及其第一方面，即语言地位规划。

⁴ Friese, Heidrun. & Wagner, Peter. *European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Shape of New Europe*, Ralf Rogowski and Charles Turner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1-86. 本文引用的外文文献，除另有说明外，皆由本文作者译为汉语。若涉及到人名，且为相关领域已有固定汉语翻译的，本文出相应汉语翻译；其他国外学者使用英文原名；引用他人译自外文的文献时，附原作者英文原名。

⁵ 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⁶ Philip G. Roeder 将 191 个国家按演变或产生过程分为三类：第一类 118 个，源于去殖民地化，占 62%，主要集中于 1816 至 1900 及 1941 至 1985 年间两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这两个历史阶段最主要的新国家产生形式，如 1816 年阿根廷及 1960 年扎伊尔。第二类 62 个，源于原有国家分裂（或从原有国家分离），主要包括奥匈帝国及奥匈帝国的解体，俄罗斯帝国及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如爱沙尼亚分别于 1918 年及 1991 年在苏联解体后独立，以及原有国家解体后的剩余国家（rump states），如 1991 年的俄罗斯联邦及 1993 年的捷克共和国，以及由外来占领当局建立的国家，如 1948 年的韩国。分裂或者分离成为 1901 至 1940 及 1986 至 2000 两个历史阶段产生新民族国家的最主要方式。第三类 11 个，其中 5 个为现有国家统一（如 1990



与国家认同都居于核心地位。而语言及语言政策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包括西方学者的关注。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对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民族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费希特指的是语言对于民族的身份标志作用。¹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在分析西欧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时，这样谈到语言的作用：“一旦划分为语族……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² 这里，恩格斯的分析既体现了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的交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既需要身份认同，也需要通过交流形成社会共同意志。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做了如下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³ 这里，斯大林没有说明语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将是否拥有共同语言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的首要条件。

多伊奇在《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提出，民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其成员相互之间能在广泛议题上比群体之外的其它成员进行更为有效地交流”。⁴ 这里显然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作用，而不是其身份认同作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分析印刷技术出现后书面语言对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时认为，印刷语言需要在不同的语言变体中确定标准文字，而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交流，这种标准的确立意味着多样性的减少，语言形式趋向固定。这使得语言不但能实现跨空间和地域的交流，也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而从前拉丁语则未能做到这一点。⁵ 安德森肯定了语言在形成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他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作用对形成民族认同的促进，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身份认同作用。这种可以记录下来的交流有助于以实现群体的共同记忆，“想象的共同体”才得以建立。

在大多数民族国家，这种与语言相联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一致。这种相对一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单一多数族群来说，其族群语言既是其身份标志，也是国家的通用语言；二是少数族群虽有与身份标志相联系的族群语言，但国家通用语也已成为他们的交流语言，这个过程发生在国家演变为民族国家之前，或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在多种因素（政治、文化、经济及语言政策等）的综合作用下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通用语实现过程中以及实现之后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认同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确定并大力推行通用语，也就是唯一官方语言的模式，成为大多数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⁶

年德国，1975年越南），另外6个为现有边缘区域（peripheral region）通过解决方案进入国际社会（如1847年利比里亚）或对原住民主权的承认（如1919年阿富汗，1932年沙特阿拉伯）。Philip G.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9.

¹ Fichte, Johann Gottlieb.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 F. Jones and G.H. Turnbull, ed. by George A. Kelly,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8, pp. 19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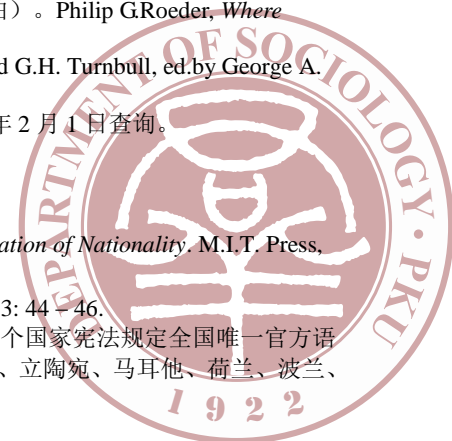
²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2017年2月1日查询。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37.htm>

³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2017年2月1日查询。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

⁴ Deutch, Karl W.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M.I.T. Press, 1953: 97.

⁵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3: 44-46.

⁶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以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为例，17个国家宪法规定全国唯一官方语言（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



沙皇俄国时代，沙俄政府力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构建文化共同体。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托维亚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推行所谓“义务国语制”，大力推广俄语，压制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只能学习、使用俄语，其它民族语言不得用于教学及出版文艺作品。¹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皇俄国时代的语言同化政策。本文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或“苏联”）在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主要失误：一是为体现民族语言平等，未能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与通用语推广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通用语推广的法律框架；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稳固之后，在实践中却超越法律框架推广俄语，并将推广俄语与创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未能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由于上述失误，原苏联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前苏联语言政策评述

苏联成立初期，其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的观点十分接近。在这篇文章中，针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俄罗斯言语报》提出的“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像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这一观点，² 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何等荒谬的逻辑！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为没有一种全国性的语言而吃了亏，倒是因为有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而占了便宜。瑞士有 70% 的居民是德意志人（俄国有 43% 是大俄罗斯人），22% 是法兰西人（俄国有 17% 是乌克兰人），7% 是意大利人（俄国有 6% 是波兰人，4.5% 是白俄罗斯人）。瑞士境内的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内常说法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受什么野蛮的警察法律（瑞士没有这样的法律）的鞭子驱使的，只是因为这个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说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法语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因为这是自由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不是用可恶的警察手段强迫使用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极其复杂而又非常落后的‘偌大的’俄国，一定要保持一种语言的某些特权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岂不应该与此相反吗？既然俄国想赶上欧洲，那它难道不应该更迅速更彻底更坚决地消灭一切特权吗？”³

但事实上，列宁也认可一个国家需要一种通用语言。他接着写道：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⁴

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另外有 3 个国家规定全国使用唯一官方语言，但法律规定有地区性官方语言（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英国）。使用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仅有 7 个（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Trifunovska, Snezana.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1: 389-606. 不过，这 7 个国家中，除比利时及瑞士外，其余 6 个国家都有在全国占优势地位的事实上的通用语。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3 页。

²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第 332 页。

³ 同上，第 332-333 页。

⁴ 同上，第 333 页。



可见，列宁的观点是：通用语不需要国家政策来推广，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然会使得人们自愿选择一种便于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将会成为国家通用语。并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列宁的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瑞士的语言模式，即国家实行官方语言多元化，不主动推广通用语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发展表明，语言多样化、缺乏通用语往往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¹ 因而推行通用语，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或事实上执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的模式，成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其次，在国家通用语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自然会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政策的促进作用不应被忽视。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些民族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民族语言。例如，德国直到19世纪才成为民族国家，但在此之前，德语已经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语言。这个过程开始于1520至1546年间，在这期间，三分之一的德语出版物都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或与其它相关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流行使得不同地区的德语变体趋向统一。² 1871年，德国统一。1876年8月，德国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规定德语为其境内唯一官方语言。³

法国的情形与德国不同。有学者认为，法兰西民族在1460年至1560年间开始形成，但当时这个“民族”指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主要包括各类官员和贵族。⁴ 不过，法语的普及要远远滞后于其民族开始形成的时间。作为西欧语言最为多样化的国家，法国除有多种法语方言外，还有7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区域，分别是北部佛兰芒语区（荷兰语，8万人，占法国总人口0.14%）、东部阿尔萨斯语区（德语，150-200万人，2.6-3.5%）、西部布列塔尼语区（70万人，1.2%）、西南部巴斯克语区（8万人，0.14%），中南部奥克斯坦语区（200万人，3.5%）、南部加泰罗尼亚语区（20万人，0.35%）以及地中海科西嘉语区（17万人，0.3%）。⁵ 由于以上多种原因，再加上农村教育落后⁶，直到1790-1791年，法国尚有48%的普通民众不具备基本的法语交流能力。⁷

事实上，早在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就颁布第一个语言法令。规定演讲、法律文件

¹ 1962年，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分析了133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和语言多样性（以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关系，其结论是：“一个国家不管其语言统一和分歧到何种程度，都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一个全民大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可能或贫或富，程度不均。但是，一个在语言方面及其繁杂的国家却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如果不是在语言起源上的同源，就是一种共同语言的广泛传播。语言的同一性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条件。没有（或甚至有）语言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统一也将接踵而至”。乔纳森（美国），《国家发展与语言多样性，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页。本文译自“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by Jonathan Pool, from *La Monda Lingvo – Problemo* 1:140-156(1969), 译者魏淑花。

² Ozment, Steven. *A Might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Peop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8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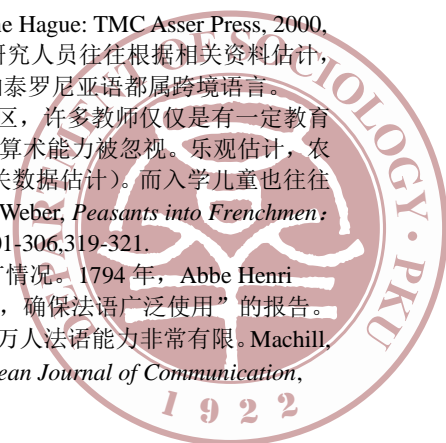
³ Blanke, Richard. *Prussian Poland in the German Empire*.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No.LXXXVI, 1981: 24.

⁴ Porter, David. *A History of France, 1460 – 1560: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10-134: 165-206.

⁵ 统计数据引自：Snezana Trifunovska (ed),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0, p.468. 说明：此处为1994年估计人数。由于法国政府没有此项官方统计，故研究人员往往根据相关资料估计，因此不同资料往往差异明显。在这7个地方性语言中，德语、巴斯克语言及加泰罗尼亚语都属跨境语言。

⁶ 当时法国农村人口比例偏高（1870年为50%），初级教育十分落后。在农村地区，许多教师仅仅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普通人，并非合格教师，学校教学也多以满足宗教为目的，基本读写及算术能力被忽视。乐观估计，农村地区6—13岁儿童的入学率也远远低于三分之二（原书作者根据1880年相关数据估计）。而入学儿童也往往由于需要工作而尽可能早地离开学校，此后便不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 301-306, 319-321.

⁷ 1790年，法国政府指派Abbe Henri Gregoire负责调查法语在法国领土上的推广情况。1794年，Abbe Henri Gregoire向法国国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消灭地方语言的必要性和方法，确保法语广泛使用”的报告。报告称，1在当时法国2千5百万人当中，有6百万人根本不懂法语，还有6百万人法语能力非常有限。Machill, Marcel. Background to French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以及法庭用语等必须使用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执政当局对法语的普及现状甚为担忧，1794年，法国颁布第二次语言立法，内容主要包括：私立学校国家化，教学语言须为法语，并颁布法令确保实行；颁布法律禁止在阿尔萨斯使用德语等。大革命领导者认为，只有普及法语，民众才能接触到民主思想，教会、地方贵族及其它地方权贵才不能阻止民众理解从巴黎发布的法律以及宣言的真正思想。¹

因此，就德国而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德语的通用语地位，国家的语言立法促进或巩固了这一进程。而在法国，法语通用语的地位主要是通过语言政策的促进作用才得以实现。

沙皇时期的俄国，与德国及法国情况完全不同：一是民族及语言关系十分复杂²，二是俄国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决定了其通用语的实现过程将更为漫长。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家体制设计上没有建立推广通用语的法律与政策框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中止了沙俄时期的语言同化政策，颁布了多项宣布各民族及民族平等、发展民族语言的法案或决定。³ 20世纪30年代，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并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⁴ 在上述历史时期，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体现了列宁关于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形成时期。

有学者将列宁的民族语言政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第二，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主张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⁵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别于1918、1924、1936及1977年颁布过四部宪法，均没有任何关于俄语地位的说明，也未提及国家通用语的推广。1936年及1977年宪法是前苏联颁布的两部主要宪法。仅有的涉及语言的宪法条款是关于学校教学语言：1936年版宪法第121条规定，“……确保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1977年版宪法第45条规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⁶

作为联邦体制，联盟宪法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平等地位及自愿联合、制定自己宪法、拥有主权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一直没有改变。⁷ 在联盟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管辖权划分上，教育

1997/12: 484.

¹ 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The Processes of Policy*, London: Cassell, 1996, pp.40-43,

² 在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及语言使用十分复杂，有大约 180 种由不同民族使用的各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利比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族包括了俄语，以及与俄语十分接近的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根据 1926 年原苏联的人口统计，以这三种东斯拉夫语为母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苏联总人口的 52%、21%、3%，在当时苏联人口中列前三名，其人口之和占当时苏联人口的 77%。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 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p. 17, 25-44.

³ 1917 年 11 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平等和所有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1918 年 10 月，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即出台了“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同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成立了用俄国各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的民族委员会。20 年代，在全苏联范围内建立了广泛使用不同民族语言教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在 20 年代初期，各民族语言在法律上取得了同俄语相同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年 4 月，第 4 页。

⁴ 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2 期，第 115 页。

⁵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488 页。

⁶ 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 155, 242.

⁷ 1936 年宪法第 15 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仅在联盟宪法第 14 条规定的范围受限。在此范围之外，每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第 16 条、第 17 条则分别规定加盟共和国制定自己宪法以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上述相同内容则包含在 1977 年宪法第 72 条及第 76 条当中。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p.143, 246-248.



一直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管辖范围。¹ 苏联宪法的这些规定在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应条款。以乌克兰宪法为例，1939年版第14条及1978年版69条都规定乌克兰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而1939年版第19条第r款、1978年版72条第13款均规定，教育事务由乌克兰独立管辖。

²

上述法律框架体现了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任何语言都不享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俄语在法律上与其它民族语言处于完全平等地位。

但在实践层面，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巩固，联盟中央介入了本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管辖的教育领域。1929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其中对语言发展的前景有如下描述：

“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十分巩固，……各民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³

这体现了斯大林在民族语言政策领域的指导思想：民族语言的消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民族融合的实现。30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巩固，苏联政府于是开始在语言政策上体现建设所谓“苏联民族”的努力。

在推广俄语之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甚至包括世界语的混合语言，来避免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斯大林于1935年提出这一思路，之后由语言学家Drezen负责组织研究实施。然而到1936年春天，“融合语言”即宣告破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新“语言”。“融合语言”失败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将使用拉丁字母的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改为使用俄语字母。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首先评估了其境内少数民族使用拉丁字母的现状并批准以新的规范俄语字母来代替拉丁字母。1937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由拉丁字母改为俄语字母。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38年3月，苏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学生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应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能力，并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⁴ 各加盟共和国随后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俄语的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更与俄罗斯文化及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学习联系在一起。⁵

根据现有史料（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尚未发现在最初的4年里各加盟共和国对该语言政策的强烈反对。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自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强势领导人，尤其是30年代苏共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压制了不同观点；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从1946年开始，乌克兰党中央开始的反民族主义斗争显示不同声音的出现：从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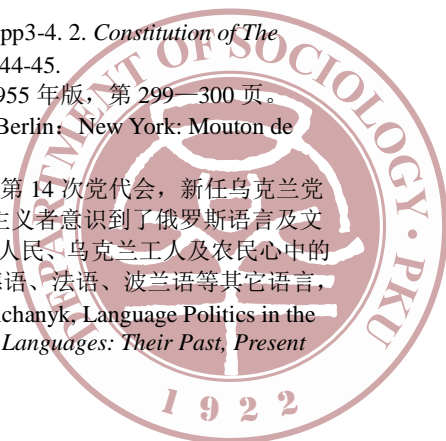
¹ 1936年宪法第14条及1977年宪法第73条规定了联盟中央的管辖权，均不包括教育。1936年版宪法第15条及1977年版第82条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其管辖范围内各项权力。Aryeh L.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p. 142-142, 246-249.

² 参见：1. *Ukrainian Constitution (1939)*, The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ion, 1950, pp3-4. 2.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78)*,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p.44-45.

³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9—300页。

⁴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p. 155—159

⁵ 乌克兰于1938年4月20日颁布了类似决议。同年6月份，乌克兰党中央召开第14次党代会，新任乌克兰中央书记 Nikita Khrushchev 在大会发言中称：“人民的敌人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了俄罗斯语言及文化的影响。他们知道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在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工人及农民心中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拒绝俄语的原因。很多乌克兰学校有德语、法语、波兰语等其它语言，但就是没有俄语……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学习俄语”。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2.



年至1948年，乌克兰党中央曾8次通过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并于1946年7月及1950年1月两次在全国公开批判了部分作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俄语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国全面展开。即使在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加盟共和国，其母语原来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从1946年开始，俄语从小学二年级也开始成为必修课。而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历史教材都以俄罗斯为主进行重新编写。1952年10月苏联19大召开前后，联共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¹

斯大林之后，在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违背列宁确立的民族政策，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文化。²当年6月，苏联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全文发表了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列宁“遗言”。“遗言”中，列宁指出要着重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³苏共20大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苏共中央将在民族政策上彻底纠正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这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并波及到民族语言政策领域，使得在斯大林时代受压制的反对意见公开化，而事实也证实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时任乌兹别克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 Nuritdin Mukhitdinov 在会上宣布将为在斯大林时代遭迫害的乌兹别克作家及干部平反。他还明确指出：一直被许多苏维埃作家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其实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他号召乌兹别克知识界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并向参会者保证，过去在民族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再也不会重犯。⁴

在乌克兰，人们最初对苏共中央的“去斯大林化”将信将疑，但随后“各种抱怨以及要求如潮水般出现——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是在文化领域……诸如‘保卫乌克兰语言’、‘讲乌克兰语’等口号在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⁵斯大林时代被噤声的政治及文化界名人重新活跃起来，乌克兰语言、文学、经济以及法律方面期刊及杂志纷纷涌现，复兴乌克兰文化的各类活动也得到了乌克兰官方默许。1958年2月6日，乌克兰官方报纸《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发表署名文章，对俄语将来有可能替代乌克兰的前景表示担忧。⁶

上述对俄语化的质疑，主要针对俄语在各加盟共和国使用日益广泛、少数民族语言受到限制、以及学校教学中忽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现状。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学习俄语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却开始强化以加强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1958年8月1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应从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调整为加速民族融合，俄语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强有力的交流工具。文章批评一些少数民族同志，在经济以及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民族利益，在处理与文化有关的问

¹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01-106

²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秘密讲话，抨击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确立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见：Leo Gruliow, ed.,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II: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85, pp. 52-53.

³ 见：Kommunist, no.9, 1956. 引自：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19

⁴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21-122

⁵ 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p. 501-502.

⁶ 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4



题时违反党性原则。文章提出非俄罗斯族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应该鼓励任何能促进吸收俄罗斯文化的努力。¹

三个月后，1958年11月，苏共发布教育改革方案。而其中关于俄语教育的条款“Thesis 19 草案”提出，儿童学两门语言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做出选择：将孩子要么送到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送到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俄语学校，民族语言将不再是必修科目。在民族语言学校，理论上俄语也不是必修课。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为出于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家长很可能选择俄语学校。这将会改变自1938年以来各加盟共和国的语言教学模式：学校采用民族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俄语是一门必修课。²

“Thesis 19 草案”公布伊始，就遭到绝大部分非俄语加盟共和国反对。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讨论 Thesis 19 草案时，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均表示反对。格鲁吉亚代表 I. V. Abashidze 的反对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警告说：“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草案未获通过。会议遂将草案其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³

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Thesis 19 草案”先后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获得通过。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定于1959年3月讨论该草案，乌克兰全国作家协会于是定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开会之前召开四次全国大会。协会主席 Bazhan 在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他引用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来支持维护乌克兰语言地位的正当性。大会通过决议，谴责“Thesis 19 草案”。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将“Thesis 19 草案”融合在一项总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对其单独讨论。最终该教育方案获得通过并于4月17日在乌克兰开始实施。⁴

至1959年夏天，仅余两个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及拉脱维亚）没有通过该草案。6月，苏共中央撤换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党的高层领导，而被革职的第一书记 I. Mustafeev 则被指控渎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另外一名被撤职书记则被指控“人为区分本地及来自其它地区的干部”。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 Kalberzins、总理 Vilis Lacis 等被撤职。除语言问题外，苏共中央还指责拉脱维亚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犯有错误。⁵至此，苏共中央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

上述联盟在语言政策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高压政策，对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乌克兰，对于苏共中央语言政策改革的反对意见一直都在持续。1963年2月11-15日，即“Thesis 19 方案”实施后第4年，乌克兰知识界在首都基辅召开全国大会，谴责了现行的语言政策，呼吁在乌克兰教育、文化及其它公共生活的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并将呼吁书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⁶1965年年底，乌克兰知名文学批评家及反对派知识

¹ 该文作者 Bobodzhan Gafurov，塔吉克人，在斯大林时代曾长期担任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该文时为苏维埃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参见：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30. 2. James Bell In Uzbekistan :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 '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 *Ecumene* 1999 6 (2)

²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1.

³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2-133

⁴ 该教育法案的英文名称是“O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School and Life and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krainian SSR”。见：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p. 75-77.

⁵ 1959年6月17-18日，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苏共中央委员 Mukhitdinov 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阿塞拜疆党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被撤换。12月1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 N.A. Ibrahimov 被迫公开承认他“在语言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New York, 1962, pp. 345-346.

⁶ 基辅大学及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了本次大会，参会者包括语言学家、大学教师、作家以及出版、报纸、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等。会议通过者通过决议，要求当面向乌克兰党中央及政府表达反对俄语化、提高乌克兰



分子 Ivan Dziuba 在《民族融合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以及法律上乌克兰语言当然拥有全部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乌克兰语的二等地位……让人不得不产生怨恨。”¹

赫鲁晓夫之后的其他前苏联领导人延续了通过推广俄语、以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指导思想。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强化了俄语作为苏联人民“第二母语”的努力。1978年10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在加盟共和国采用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实施新的教学大纲，进一步强化俄语教学，并在俄语不是主要教学语言的民族语言学校设计了新的俄语教学大纲。² 该措施可以视为赫鲁晓夫时代“Thesis 19”条款的进一步延伸。

有学者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³ 早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就宣称：“党解决了人类世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和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涉及俄语学习，宣称俄语是苏联人民的“第二本族语”。⁴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苏联人民”这一目标，并于1971年在苏共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对“苏联人民”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表述：即“具有共同的领土、国家、经济体系及文化，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具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体”。⁵ 这一表述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十分类似，只是将“共同语言”从第一位移至最后一项。1979年苏联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总人口的82%都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俄语。⁶ 应该说，俄语的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苏联的民族问题其实远未得到有效解决。

本文认为，对于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俄语只是族际交流语言，将俄语称为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二本族语”是一种并不妥当的提法，夸大了俄语在创建“苏联人民”过程中的作用。其结果是伤害了非俄罗斯族人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三、结论与思考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在民族构成与民族语言十分复杂的前苏联，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前苏联为了显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在联盟宪法及重要的语言法案上强调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也大都含有民族语言是其共和国国语、⁷及

语地位的四项诉求。包括：1、在高等及参见：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3-4.

¹ 该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并分析了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偏离列宁民族政策的错误做法，并以大量篇幅批驳了联盟的语言政策。1965年年底完稿后，作者向乌克兰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转交该书。乌克兰党中央在小范围内（包括乌克兰25个州的主要领导）散发了该书，该书后流传到上述范围之外。该书于196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Ivan Dzi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amelot Press Ltd, London and Southampton, 1968. pp. xvi, 150.

²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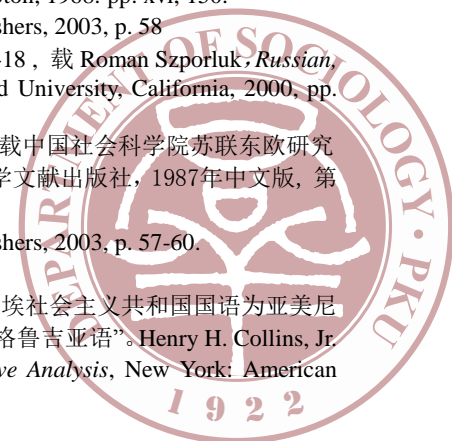
³ 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 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da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⁴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50页。

⁵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 57-60.

⁶ 同上，第58页。

⁷ 例如，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亚美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宪法第156条规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语为格鲁吉亚语”。Henry H. Collins, Jr.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ixteen Constituent or Union Republ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American



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或尽可能以母语进行的条款。¹可以说，俄语与各民族共和国民族语言处于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建立起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这是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主要失误之一。前苏联在其后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弹。假如前苏联能够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联邦制性质，取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以及可以退出联盟的条款，强调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教育由联盟统一负责，同时宪法明确俄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斯大林 1938 年开始的将俄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就完全合乎宪法原则。在坚持这一双语教育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俄语教育，使其逐渐成为苏联的通用语，将在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交流及融合的同时，最大限度缓解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²

将俄语作为通用语进行推广，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与前苏联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并不矛盾。但通用语的推广不同于学习母语，母语有民族身份的标志作用，而通用语的学习则是为了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而在前苏联，俄语的推广是与俄罗斯文化的推广联系在一起。而1958年11月发布的俄语教育改革“Thesis 19方案”则试图以俄语代替民族语言，违背了原苏联民族语言的平等原则。那么，这种可能会引发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反弹的语言政策，从长远看，是否有利于强化非俄罗斯民族对于原苏联的认同，即有利于所谓“苏联人民”的建构呢？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本文认为，在原苏联的联邦体制下，即以民族构成作为设置加盟共和国的原则，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里之所以给出否定的答案，也不完全出于原苏联最终解体的事实，而是语言同化在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历史上不乏类似的失败先例。

以英国为例，苏格兰自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成立统一的不列颠王国之后，苏格兰人的母语盖尔语就逐渐让位于英语。1900年，仅有6%苏格兰人口使用盖尔语，到1991年，在苏格兰496万人口当中，能讲盖尔语的人口仅占1.4%，³ 苏格兰已成为英语地区。但近年来苏格兰民族主义思潮似有不断加剧的趋势，2011年5月，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胜，在全部129个席位中占有69席。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投，多达44.7%的投票者在公投中支持独立，⁴ 虽然最终因为55.3%的投票者选择留在联合王国，英国的统一得以维持，但强烈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倾向可见一斑。

另一个例子是爱尔兰。早在12世纪，盎格鲁-诺曼人就曾凭借其军事优势很快占领了爱尔兰四分之三的地区，但随后在爱尔兰人的反击下节节败退至东海岸都柏林附近面积狭小的区域，那些留在爱尔兰的盎格鲁-诺曼人则被爱尔兰文化同化。直到16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重新征服爱尔兰，此后英国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1850年，仅有45%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1891年，这一比例仅为

Russian Institute, 1950, pp. 9, 18.

¹ 例如，1937年版乌克兰宪法第101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以母语进行。1978年版乌克兰宪法第43条规定，学校教学语言尽可能以母语进行。见：1.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January 30, 1937)*, New York: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April 1950, p.13. 2.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April 20, 1978)*, Kiev: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 32. 上述乌克兰宪法条款与1936及1977年版苏联宪法的相关条款的内容完全一致。

² 那么，从1923苏联成立，至1989年解体。苏联有没有机会对宪法做如上修改，以实现列宁提出“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呢？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而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假如斯大林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结束列宁提到的“过渡”时期，在当时的苏联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这样做应当不会有什么阻力。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后的40年代后期，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见：马戎，《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8年2月20日，第46期。

³ Dennis Ager,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6, p.49.

⁴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topical-events/scottish-independence-referendum/about>, 2017年2月6日查询。

19.2%，大约66万人，¹ 1911年下降为12%，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² 爱尔兰同样成为一个英语地区。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限于篇幅，本文对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不做具体分析。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³ 至少在语言因素方面，这一观点显然适合苏格兰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特征，似乎也同样适合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因为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苏格兰、爱尔兰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有一点是一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行政区域依据民族构成设置。安东尼·史密斯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时曾经提到，“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领土属性。即，某一特定的人口群体，生活能自由迁移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拥有这一特定领土，则被认为是这一特定人口群体的权利。”⁴ 当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前苏联以民族构成为原则的加盟共和国联邦体制，无疑有利于各加盟共和国不断强化其民族认同。俄语的推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促进苏联国家认同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或许其原因在于：通用语的作用在于消除不同族群之间因语言造成的交流不便，进而促进人员相互流动，而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而在前苏联，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程并未发生：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为：俄罗斯人移居至其它加盟共和国，而除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很小。⁵

【论 文】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⁶

张宏莉⁷

摘要：中亚五国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缩减俄语使用范围、有意进行文字改革的举措使俄语彻底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辉煌，俄语地位被严重“边缘化”。然而，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俄语仍然是主要的族际交际语言。语言政策与现实需求的背离，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环境恶化促使人口外迁，不懂俄语制约劳务输出，字母拉丁化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俄语的语言功能被认知为与俄交往的利器。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过于政治化，语言完全被某些政治家视为政治游戏的手段，而未把它当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直接影响中亚五国语言政

¹ Riagian, P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 –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² A.C. Hepburn, Languag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eland since 1880,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ume 2, Number 2, 2001, p. 202.

³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⁴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5, p. 56.

⁵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4

⁶ 本文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72-79页。

⁷ 作者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